



汪榮祖人物書系

康章合論

汪榮祖◎著

Biographical Studies by Young-tsu W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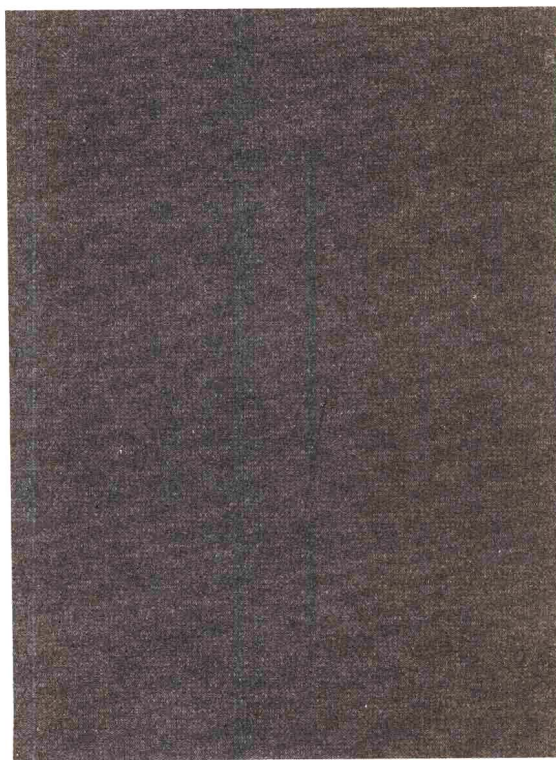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

汪荣祖人物书系



康章合论

汪荣祖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康章合论/汪荣祖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8. 8
(汪荣祖人物书系)

ISBN 978-7-101-06119-2

I. 康… II. 汪… III. ①康有为(1858~1927)
—思想评论②章炳麟(1869~1936)—思想评论
IV. B258.5 B25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4017 号

书 名 康章合论

著 者 汪荣祖

丛 书 名 汪荣祖人物书系

责任编辑 高 天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0 插页 5 字数 100 千字
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6119-2

定 价 20.00 元

汪榮祖人物書系

康字合論

榮祖





康有为 (长素, 1858-1927)



章炳麟（太炎，1869—1936）

康章合論自題

又見風騷五百年 康章各領一方天
異同門戶分朱陸 博洽研綜假鄭邊
雙筆搖揮考造化 故塵卓著為山川
鴻痕舊跡猶能識 鳳紙新裁作史篇

丁卯仲夏 容美東柏僊

榮祺



《康章合论》自题

汪荣祖

又见风骚五百年，康章各领一方天。
异同门户分朱陆^①，博洽研综儗郑边^②。
双笔摇挥参造化^③，劫尘辛苦为山川。
鸿痕旧迹犹能识，凤纸新裁作史篇。

① 朱熹主敬，陆象山主静；朱重道问学，陆重尊德性；朱王即物穷理，陆言心即理，宗旨各异。

② 郑玄、边韶皆东汉名儒。

③ 韩翃诗有云：“百城兼领安南国，双笔摇挥王左君。”李白《上韩荆川书》则有笔参造化之句。

人物书系序

传记作品在当今的书市里，仍属大宗；通俗性的名人传记，尤其受到读者们的欢迎。学术性的传记，虽未必畅销，却在史学著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西哲培根(Francis Bacon)认为史有三要，即时、人、事；然则，人与时、事，实鼎足而三。中华史学的主干就是纪传体，纪与传都是传记，即章学诚所谓“包举一生而为之传，史汉列传体也”^①；不过，传统中国的列传，大都失之简略，几乎没有大叙事体的详传，而又往往以儒家价值观来褒贬人物。

西方早期的传记则褒而不贬，歌颂贤君圣徒，视为上帝的模范生，作力人间的示范，如《拉丁载记》(*The Latin Chronicle*)几乎都是这类人物的传记，反映文艺复兴前西方神权统治下对所谓伟人的偶像化与理想化，与曾国藩所说：“司马氏创立纪传，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敝者，独赖有伟人焉，以经纬之，故备载圣君贤相，瑰智玮才”^②，在精神上甚是切合。文艺复兴之后，始有褒有贬，略同儒家

① 章学诚，《文史通义》(台北：国史研究社，1972)，页154。

② 曾国藩，《曾文正公文集》(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木刻本)，卷二，页23。

褒贬的涵义。

直至近代西方,包斯威尔(J. Boswell)写老师约翰生(S. Johnson)的一生,巨细靡遗,皇皇长篇,写得栩栩如生,具有高度的可读性,成为名作;此传的优点主要是学生亲炙老师,得以就近观察,体会殊深,但所记晚年详而早年略,并不是一部均衡的传记,固然是旷世名作,却不能说是现代传记的典范,而包斯威尔之后久无传人,一般的传记作品,仍然意图美化伟人,使传记成为一种“遮羞艺术”(the art of concealment),意不在展露人性,实在掩盖人性,得不到其人的真面目。20世纪之初的英国,出了一个传记写作奇才斯特雷奇(Lytton Strachey),所写《维多利亚名人合传》(*Eminent Victorians*),不但不奖饰传主,而且纵嘲讽幽默之笔,暴露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虚伪性,因其文才洋溢,确立现代传记的文学性格;惟就史家的标准而言,未多求证史料,不够谨严。

史学家以历史人物为写作题材,乃顺理成章之事,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必然是历史的重要内容;不过,历史学家除了重视历史人物之外,更要重视历史人物的时代与处境,不论时代创造了人物,还是人物创造了时代,两者之间的关系皆不可忽略。故史家立传,不仅需要文学家描述人物的文字技巧,而且还要具备了解人性、时代与社会的充分知识与分析能力;如果前者是“艺术”,则后者近乎“科学”。如何结合文笔与研究、个人与群体、时间与空间,应是史家写传的基本面。然则,史家要确切地重现古人风貌,固然要写评其一生,展示其形象,分析其对时代的影响,更要信而可征,风雅可读。

我于19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研究院时,曾任俄国史名家屈莱果(Donald W. Treadgold)教授的研究助理,并以俄国

史为我的副科之一，所读佳著之中有不少出自史家之笔的俄国历史人物传记，屈教授的《列宁及其政敌》一书^①，即其中之一。列宁为俄国新兴“知识阶层”(Intelligentsia)^②之一员，而知识阶层的兴起，则由于帝俄农村经济之破产，民不聊生，知识阶层为民请命而专制政府不予垂听，遂驱使关切民瘼的知识之士走向暴力革命，各为俄国的前途拼博，列宁即其中之一人，并于1898年乘群众政治运动兴起之际，逐鹿问鼎。马克思主义革命风潮之所以得势，固有其系统哲学为之鼓动，然屈师尤注意逐鹿群雄中之自由主义派的软弱，其领导人如施波夫(Shipov)与米留可夫(Miliukov)，不仅其组织松散，且乏明确之理论与目标，对当时俄国的局势又无清晰之认识。至于社会革命派(SR)的领导人切尔诺夫(Chernov)，对阶级斗争并无认识，故难以建立坚固的社会阶级基础，虽注意到农村问题，但又无正确的农村计划，采暗杀手段，亦非长久之计。相比之下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(The Bolsheviks)于1905年已有赢得政权的方案，知道群众之所好，并打入其中，直至大势既定，掌握权力之后，方显其真正之政治意图。屈师的结论是，列宁早于1906年实已胜券在握，克伦斯基(Alexander Kerensky)虽然赢得二月革命的胜利，并无稳定政权的实力。列宁在历史上的重要性，莫过于在俄国建立红色政权；作者将传主及其对手比而观之，从中得悉列宁的成功，不仅仅由于其人之强，亦由于其竞争对手之弱，借传观史之视野，顿为之开阔，对我甚有启发。

① Donald W. Treadgold, *Lenin and His Rivals: The Struggle for Russia's Future, 1898 - 1906* (New York, 1955).

② 所谓知识阶层，乃由非同一社会经济出身而具有相当教育程度之男女所组成；他们不论经何种渠道获致知识，莫不关怀其所处之社会问题。

当时阅读所及,至今仍有印象的还有马克麻士特所著《俄国极权哲学家戴尼列夫斯基传》^①。此传亦以人物来衬托历史,作者力言历史乃人所创,而人受时代环境之影响。戴尼列夫斯基所处之时代,西潮正冲击俄罗斯,外来思想为当地制造了不少心理上与文化上的难题;作者以为戴氏之极权思想固然有其历史渊源,亦具时代使命,极权实为解决时代难题的一种方法,下开中央极权政治之先河。此传借一位极权思想家戴尼列夫斯基,展开自帝俄到俄帝在思想上的承袭关系,而此人正是此承袭关系中的重要关键,不仅突显了传主在历史上的重要性,而且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,也对我甚有启发。

英美学术界人士研究中国历史也往往从传记入手,就近现代学术思想人物而言,如《近代中国与新世纪:康有为思想研究》^②、《追寻富国强兵:严复与西方》^③、《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变》^④、《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流》^⑤、《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》^⑥、《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》^⑦等等,我自己也曾写了一本《追寻现代民

① Robert E. McMaster, *Danilevsky: A Russian Totalitarian Philosopher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).

② K. C. Hsiao, *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: K'ang Yu-wei, Reformer and Utopian, 1858-1927* (Seattle & London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74).

③ Benjamin Schwartz, *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: Yen Fu and the West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4).

④ Hao Chang, *Liang Ch'i-ch'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, 1890-1907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1).

⑤ Maurice Meisner, *Li Ta-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).

⑥ Laurence A. Schneider, *Ku Chieh-kang and China's New History: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1).

⑦ Jerome B. Grieder, *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: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, 1917-1937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0).

族主义：章炳麟与革命中国》^①，都是以重要人物为中心来展示学术思想的历史面貌。在华人世界里，自“五四”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，突破传统纪传的格局，以白话书写西洋式的详传或大传，犹如雨后春笋。

我于1978年首次回到台湾任教一年，因出版社的鼓励，开始有计划地用中文写作，其中有关传记的计有《史家陈寅恪传》、《康章合论》、《走向世界的挫折——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、《章太炎研究》、《康有为》、《蒋介石评传》（与李敖合著）。去年秋天在北京，承中华书局提议出版我的传记作品系列，我欣然接受；我先将相关论文编成一集，曰《学人丛说》，权充系列的第一卷，其他各卷陆续付梓。我尚有写几部传记书稿的计划，我的《史家陈寅恪传》只写其一生，而其身后热闹非凡，议论亦多，应补写一本《陈寅恪身后叙》。钱锺书的文史哲学，令人倾倒，我有幸成为他的忘年交，屡允侍谈，屡蒙赐函，甚觉亲炙其人，再读其人之书，别有领悟的喜乐，很想写一本《槐聚学记》，以志此机缘。我在研究章太炎时，觉得他的文化观点颇似柏林（Sir I. Berlin）所说的“文化多元论”（cultural pluralism），而此一文化观点也可见之于西潮冲击下的俄国与日本，受西潮冲击的中国自不能例外；太炎虽在中国首发此义，并非独一无二，我甚愿写一本《民国六学士——中国现代文化多元论者》，以便详加发挥。中华书局已经预约这三本尚未动笔的稿子，我也在此预告，即洋人所谓“预（雨）支票”（rain check）也，同时给自己必须要完成书稿的压力。

近年来，中国大陆出版业兴隆，书市蓬勃，使我在台湾出版过

^① Young-tsu Wong, 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, 1869-1936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).

6 康章合论

的一些旧书,能够在大陆获得新生命,而且市场大、流传广,远非岛内可比。任何作者必定以读者多为荣,而我更感高兴的是,著名的中华书局愿意出我的书。中华书局牌子老、底子硬,出了许多学术名著,包括钱锺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在内,我的书侧身其间,与有荣焉!

汪荣祖

2006年7月27日于美东马州之帝乡

目次

1	序说
7	甲篇:评价康章的若干障碍
31	乙篇:康章思想之异趣
61	丙篇:康章与晚清思想的解放
95	丁篇:康章与民国初年的新思潮
119	结论
128	后记
131	书目
145	索引

序 说

南海康有为(长素,1858 - 1927)与余杭章炳麟(太炎,1869 - 1936)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溢洋的一对人物,无论是正史上或野史上的记载,都可说是多彩多姿。但家喻户晓的人物,不一定容易被人了解,有时名声愈高,误解愈多。名人为大家所知,但人人所知的名人,不一定是名人的真面貌。康有为与章炳麟就是这样的名人,所以本文甲篇首要揭除掩盖康、章两氏真面貌的重重帘幕。

康、章两氏虽属同时代之人,但无论在性情上和思想上,都大不相同。例如,康氏重仪表,主乐利主义,而章氏恰恰相反,蓬首垢面,几近禁欲主义。本质与取径既异,长时为敌就不足为奇。两人虽各名重一时,终生似未曾有一面之缘。唯一较为相契之时,是短暂的戊戌前后一段。长素公车上书时,爱国情操颇得太炎的倾心,因此而加入上海强学会,参加《时务报》的工作。终因“康党诸大贤,(欲)以长素为教皇”,以为“病狂”^①,而离开《时务

^① 见章太炎致谭献函影本(原函钱锺书先生藏),收入汤志钧编,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,上册,页14。

报》，别树变法旗帜。但戊戌政变后，太炎虽未直接介入此一政治活动，然因敬佩改革者的烈士形象，对康有为、梁启超油然而生景慕之心，特于戊戌（1898）年十一月驰书长素致意。康氏值此危难时刻，突然接到情意深切的慰问书，大为感动，回了一封热情的复函：

枚叔先生仁兄执事：曩在强学会，辱承赐书，良深感仰，即以大雅之才、经术之懿告卓如。顷者政变，仆为戮人，而足下乃拳拳持正义，又辱书教之，何其识之绝出寻常，而亲爱之深耶？台湾瘴乡，岂大君子久居之所？切望捧手，得尽怀抱。驰骋欧美，乃仆夙愿，特有待耳。兼容并包，教诲切至，此事至昌明，仆岂不知，而抱此区区，盖别有措置也。神州陆沉，尧台幽囚，惟冀多得志士，相与扶之，横睇豪杰，非足下谁与？惟望激昂同志，救此沦胥！为道自爱，书不尽言。十一月十五日，有为再拜。^①

太炎接读此信时，尚住台湾，“忽得工部报书，眉宇盱扬，阳气顿发，盖不啻百金良药也”^②。兴奋之情，跃然纸上。有人问起，何以相昵之深？太炎的答复是：

予不见夫水心、晦庵之事乎？彼其陈说经义，判若冰炭，

^① 载《台湾日日新报》，汉文版，1899年1月13日。康函与太炎识语重刊于《复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，1982年5月，3期，页100～101。另重刊于王仲萃主编，《历史论丛》，第4辑，页20～21。

^② 见《台湾日日新报》，汉文版，1899年1月13日。